



论马桥文化的起源



焦天龙

(美国毕士普博物馆

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

自从马桥文化的命名在 20 世纪 80 年代被确定以后,有关其起源的讨论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焦点之一,并曾经产生过较大的分歧。争论点之一是马桥文化是否与良渚文化有演变关系,或这种演变关系有多大。另一个争论点是马桥文化与浙江省江山县肩头弄第一单元文化的关系,在二者是否有演变关系或只是影响关系上,学者们的分歧曾经很大。大部分学者都认为马桥文化的发源地是浙西南和闽北地区,以浙江省江山县峡口肩头弄的所谓“第一单元”陶器群被作为马桥文化的祖先文化。但也有很多学者坚持马桥文化继承了很多良渚文化的因素,应该是本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延续。近年来,随着广富林文化在环太湖地区的认识,表明马桥文化和良渚文化在年代上有一定的距离,二者并没有发生过直接接触,于是大部分学者的意见又趋向统一,即认为肩头弄第一单元文化向北方的扩张是马桥文化形成的主要因素,肩头弄第一单元文化是马桥文化的最终发源地,在扩张到环太湖地区和浙江东北部以后,又接受了北方地区的很多影响,尤其是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的影响。马桥文化作为从浙西南和闽北地区移民而来的文化,似乎已经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公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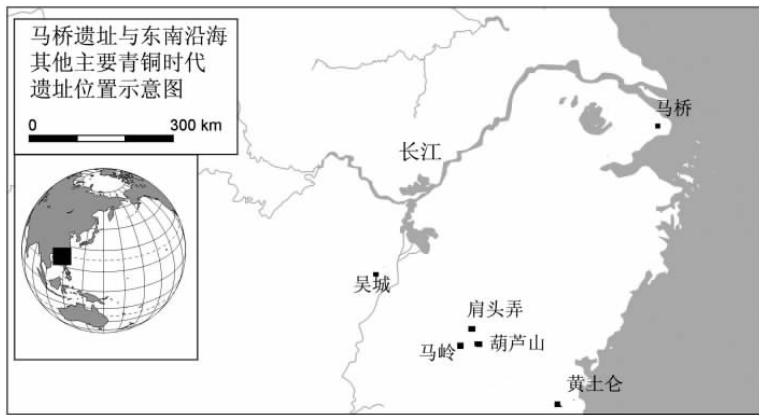
由于马桥文化是目前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发现的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其起源不仅关系着东南沿海青铜时代的发端,而且关系着在青铜时代的早期,东南沿海地区是否发生过较大规模的族群迁徙和文化取代问题,因此

应该深入讨论(图一)。根据新公布的马桥文化材料和闽北地区近年来的一系列考古新发现,笔者认为,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将肩头弄的所谓“第一单元”陶器群作为马桥文化的祖先文化带有很强的假设性,缺乏系统的考古材料的支持。这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浙江西南地区 and 闽北地区的考古材料匮乏,文化年代序列不清楚所造成的。但是,过去十余年来,这一地区的考古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为我们重新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更好的材料基础。新材料表明,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文化是自成系列的,也是相当复杂的。根据对主要器物群的对比,我们认为马桥文化的主体部分不是发源于浙西南闽北山地,也不存在大规模从这一山区向环太湖地区的移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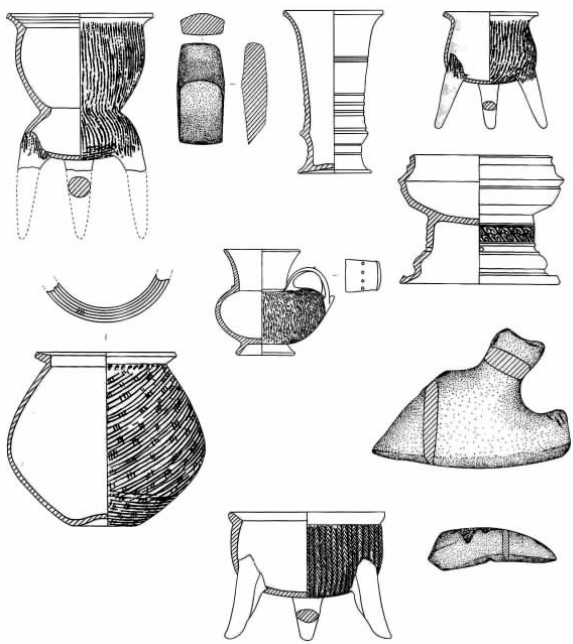
一、马桥文化的特征和年代

马桥文化主要文化内涵以一群独特的陶器群和石器为代表。以马桥遗址为例,陶器以泥质陶为主,占 73%,夹砂陶占 27%。陶色则以红褐为主,仅泥质红褐陶就占 51%,另外夹砂陶中绝大部分也呈橘红色或灰黄色。少部分泥质黑陶的器表施加一层黑衣。绝大多数陶器外表都有装饰纹样。泥质陶纹样种类最丰富,有条纹、条格纹、叶脉纹、方格纹、

席纹、叶脉纹、云雷纹等。夹砂陶则以绳纹为主,少见附加堆纹。部分陶器的口沿有陶文。器形有鼎、甗、罐、三足盘、觚、簋、豆、钵、盆、鸭形壶等,以三足器(鼎、甗、罐)和各种形态的罐最多。



图一 马桥遗址与东南沿海地区其他主要青铜时代遗址位置示意图



图二 马桥文化典型陶器和石器(均出土于马桥遗址)

相当比例的罐类器为内凹底、束颈无领。石器以石锛和斜柄刀为主，其中石锛绝大部分为有段石锛。已经出现青铜器武器和工具，如小刀、斧和镞等，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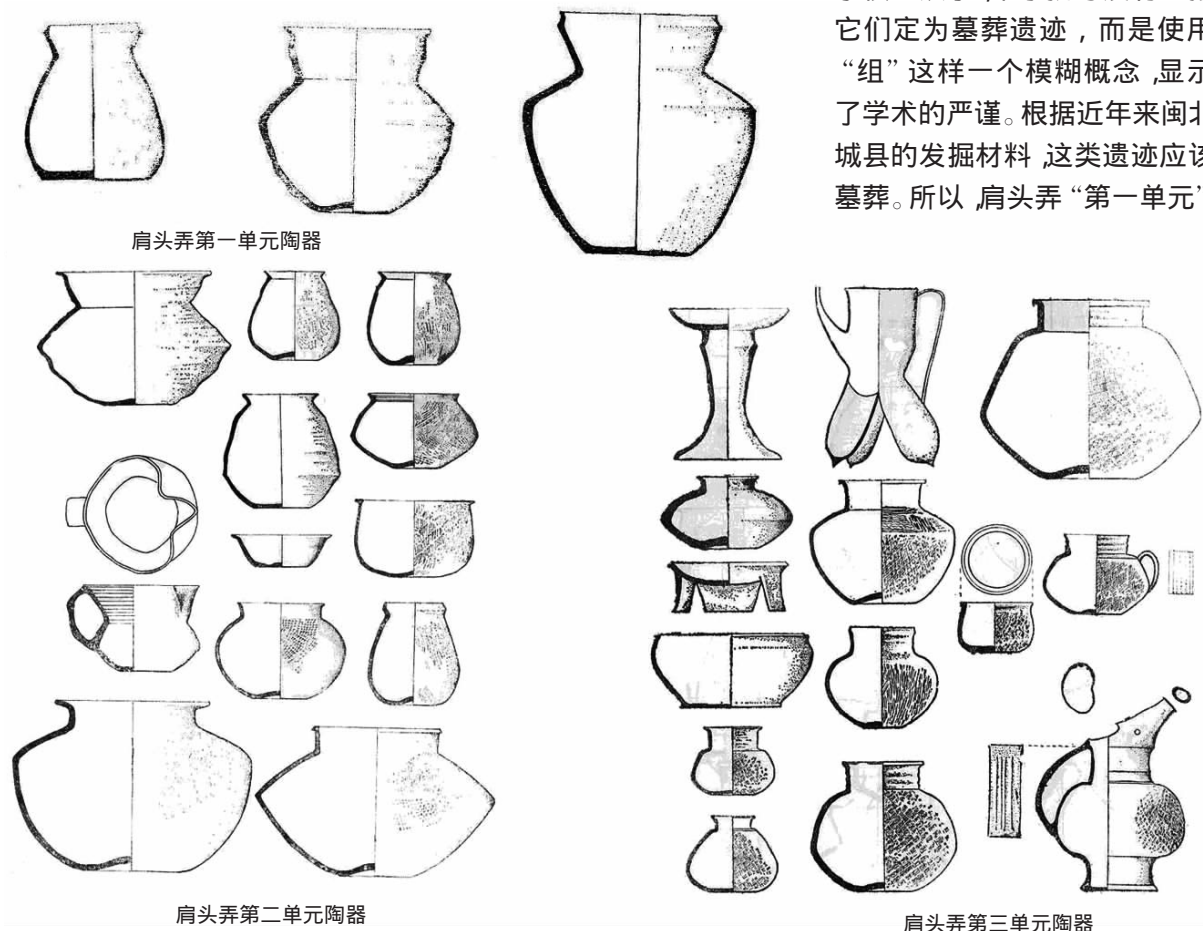
见青铜容器(图二)。一般认为,马桥文化最早出现于公元前 1900 年左右,消失于公元前 1200 年左右,前后共有约 700 余年的历史,可分成三期。其主要分布地区是环太湖地区和杭州湾南岸的浙江东北部。在这一区域之内,各遗址之间虽然存在一些不同,但总的文化面貌呈现出相当强的相似性。

二. 肩头弄遗存

肩头弄遗存是发现于浙江省江山县峡口镇江山林场和肩头弄电站公路之间的 5 个山丘上的 16 组陶器,发掘者牟永抗等将其归为三个单元。这些遗存发现于 1977 年冬和 1979 年夏,所有成组遗物均为试掘所得,各组遗物之间均无同层或叠压打破关系。

所谓的肩头弄“第一单元”,指的是肩头弄的第二号山的第2组陶器群,即肩(二)2。据发掘者解释,之所以使用“组”这一概念,主要是因为这些器物成组出土,但因为后期破坏严重,“地面已无土墩形迹,仅露出若干器物的口沿,稍加清理后发现排列紧凑的一组器物,而没有找到墓的明显边壁界限”。尽管推测这是土墩墓的可能性较大,但为

了慎重从事,牟永抗等没有直接将它们定为墓葬遗迹,而是使用了“组”这样一个模糊概念,显示出了学术的严谨。根据近年来闽北浦城县的发掘材料,这类遗迹应该是墓葬。所以,肩头弄“第一单元”实



图三 肩头弄第一至第三单元陶器

际上就是一座墓葬的随葬品。这组陶器共 10 件,其中 9 件是罐(高领罐、深腹罐、匣形罐),1 件为豆,“其特点是器表内外均着染成黑色,各器器表的黑色浓淡不一。有的内壁局部胎面未曾染及,推测这种黑色似用相当稀薄的浆液着染而成。可能是模拟黑陶的一种产品,以着黑陶名之。以示与黑陶、黑皮陶相区别”。这也是学术界首次使用“着黑陶”名称。严格地讲,这些陶器的黑色外表就是一层黑衣,所以应该称其为“黑衣陶”更合适。

第一单元与第二单元陶器群的主要区别是后者均有印纹陶。第二单元共有 8 组器物群,即肩(一)1、2,肩(三)1、2、3、4,肩(五)1、2。这八组陶器群分布于三个有一定距离的山头上,共出土印纹陶 18 件,黑衣陶 28 件。其实,这组器物群全部都是通体施黑衣,所谓的印纹陶只是在黑衣之上又有条纹、斜向方格纹等纹饰。胎质、器类也基本与第一单元相同,主要是高领罐、深腹罐、匣形罐,大部分器物的底部内凹。另外还有少量的豆或圈足盘。从这些特征分析,这两个单元的区别实际上是很小的。考虑到第一单元是被严重扰乱过的墓葬,随葬器物群已经不全,而且其深腹罐和匣形罐也都饰条纹,所以肩头弄的第一、第二单元应该是同一时代的遗存(图三)。

与此相对比的是,第三单元的九组器物群中,只有两件黑衣陶,并有较多的土黄色的泥质陶,与第一和第二单元的器物群表现出较大的差别。不过,相当部分印纹陶罐的器型和纹饰风格仍然是相似的,表明或许在年代上相去不远。不过,牟永抗等除了指出其年代应该晚于良渚文化外,并没有做进一步推断。在 1984 年和 1993 年,牟永抗先后发表了两篇文章,将在浙江发现的这类遗存命名为“高祭台类型”的早期文化,并推论“马桥类型可能是和高祭台类型早期同时并存的两个类型”。

三. 闽北地区遗存

与肩头弄第一、第二和第三个单元的陶器群相似的遗址在闽北发现很多,普遍分布于闽江上游的浦城县、武夷山市、光泽县、邵武县、建阳市和松溪县等地。已经调查发现的遗址约 60 余处,部分遗址经过一定规模的发掘,如武夷山市的葫芦山下层、光泽县的马岭和汉坪山墓葬、浦城县的猫耳山(此遗址曾被称“猫耳弄”或“猫耳拔”,现通称“猫耳

山”)遗址、管九村社公岗二号墩外围的八座墓葬和邵武县的斗米山遗址等。其中以葫芦山、斗米山和猫耳山的发掘规模最大,发现了一批墓葬和陶窑,取得的材料在这类遗址中比较丰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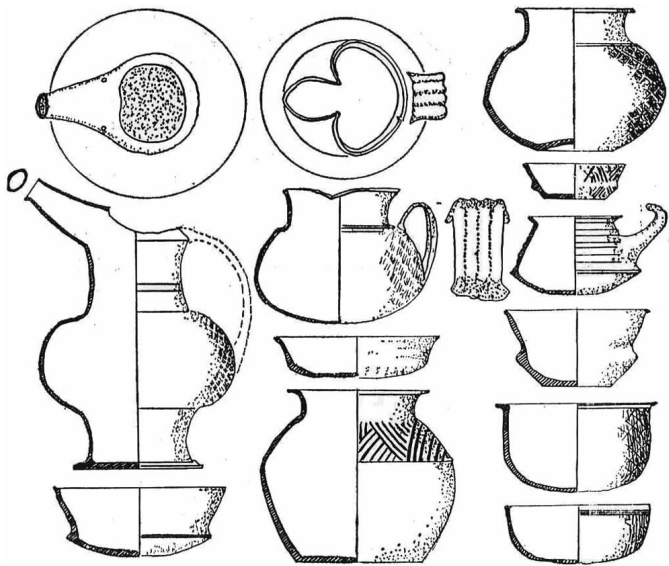
(1) 马岭遗址

位于光泽县的马岭遗址在 1981~1983 年的福建省第二次文物普查中经过试掘,清理了两座残墓葬(M1、M2)。遗址位于崇仁乡池湖村东部的一座山丘上,这两座墓葬均位于山丘的南部,为长方形浅坑。发现时陶器均已经暴露于地表,无人骨和葬具发现。M1 在发现时,其中部还被一条流水沟冲断,遭破坏较严重,但仍出土了 23 件陶器。M2 出土了 22 件陶器。这些陶器被分成硬陶和软陶两类,其中有 11 件器物内外均饰黑衣或褐衣。器型以凹底的高领罐为主,另外还有单把壶、杯、长嘴盃等。纹饰以拍印的条纹、方格纹、回形纹、菱形纹等为主,属于广义的几何印纹的范畴。发掘主持人林公务判断这群陶器与肩头弄的陶器群是完全雷同的,它们应该是同时代的遗物。这一判断显然是正确的。

从调查的简报分析,除了墓葬以外,马岭遗址还应该居住或陶窑遗迹。在遗址的北部发现了红烧土圈,并在附近发现了石铤、陶纺轮、石锄等遗物。遗憾的是,马岭遗址从未进行过正式的发掘。所以,我们对此遗址的认识也一直局限在这两座残墓上(图四)。

(2) 葫芦山遗址

1990~1992 年,福建省博物馆对位于武夷山市



图四 马岭墓葬陶器

兴田镇西郊村的葫芦山遗址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23座陶窑和一批建筑遗迹、墓葬,并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石器,首次为全面了解认识这类遗存提供了系统的材料。

葫芦山是一座相对孤立的小山丘,文化堆积遍布山体,但以南坡堆积较厚。主要文化堆积可分五层,其中第3~5层文化内涵均以黑衣和褐衣陶片为主,其特征与马岭墓葬和肩头弄第一至第三单元的出土器物基本一致,表明其时代同时或相距不远。陶窑均发现于第4层下。陶窑在废弃后,其基址上建造了房屋,而第4层则为房屋废弃后的堆积,并含有较多的石镞、石镞等。第5层堆积较薄,主要是陶窑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废弃堆积。很显然,葫芦山是一处以生产陶器和居住为主的聚落遗址。

陶窑的发现是一个重大突破,为研究这一时期的陶器烧造技术和产地提供了重要材料。陶窑大都为横穴式,窑坑平面呈“8”字形。个别窑室呈圆形或长方形。部分窑室结构比较复杂,如8号窑有环窑壁的两条弧形火道,中间还有一条直火道,使火能更均匀地触及窑室的各个角落,显然有助于提高烧造陶器的成功率。

比较遗憾的是,这处重要遗址的发掘报告至今仍未发表,从而限制了学术界对其更深入的研究。根据我和当年发掘的主持人杨琮一起最近对该遗址的勘查,遗址地貌依然如旧,保存相当好。未来如果能对该遗址进行再发掘,系统采集有关年代、经济形态和环境的资料,将会极大促进对该遗址和同类遗址的认识。

(3) 斗米山遗址

斗米山遗址是继葫芦山遗址之后,福建省博物馆在闽北地区大规模发掘的另一处重要遗址。遗址位于邵武市沿山镇百樵村东的一座孤立的山丘上,总面积约7000平方米,相对高程约10~15米,其东部有一条小溪流过。1995年,福建省博物馆对该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发掘面积达1402平方米,发现了一批房屋、墓葬和大量的陶器、石器等文化遗物。

遗址的文化堆积有五层,根据出土遗迹遗物的特征,发掘主持人林公务将3~4层称为上层文化遗存,5A~5B层为下层文化遗存。下层文化遗存是与牛鼻山文化同相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而上层文化遗存特征与马岭墓葬、葫芦山遗址和肩头弄第一至第三单元的出土器物基本一致,表明它们属于时代相近的同一类文化遗存。发掘主持人林公务认

为这是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遗存,或是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过渡期。

上层文化的遗迹包括7个灰坑和15座墓葬。墓葬多为浅土坑墓,除了成组的可复原的器物外,未发现人骨和葬具。这批墓葬主要分布在遗址的北部,大小不一,大者长5米多,小的仅长1.5米左右。随葬器物最多的只有11件陶器,多数只有2~3件。这表明遗址的北部应该是当时聚落的墓地,而南部则为居住区。

出土的数万件陶片、玉器和石器极大地丰富了对该类遗存的认知。墓葬中出土的完整和可复原陶器约51件,其中80%以上施黑衣,以形态繁多的各式罐、尊和豆为主。第3层出土的陶片中,除了与墓葬中相同的器物外,还包括双耳罐、双耳壶和数量较多的纺轮等新器类,而且印纹硬陶的数量明显增加,在年代上比墓葬要晚。出土的石器仍以镞、镞、斧、刀、凿为主,但也新发现了石戈、石矛等武器,玉器只发现了三件,器形为锥、玦和环。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些石、玉器均发现于地层堆积中,而不见于墓葬。这一点与下文化层墓葬中随葬玉器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

斗米山的发掘,以明确的地层关系表明,以黑衣陶为主的遗存是晚于以红陶为主的牛鼻山文化遗存的,这就为建立闽北地区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提供了可靠的地层证据。但是,遗憾的是斗米山遗址未能进行系统的年代测定。发掘主持人林公务根据对周边地区含相似文化因素的遗址的比较,推测上文化层的年代在距今3500~4000年间,而下文化层的年代则距今4500~5000年之间。

(4) 猫耳山遗址

猫耳山遗址位于浦城县仙阳镇西南约一公里处的山坡上。2005年,为了配合高速公路建设,福建博物院、南平市博物馆和浦城县博物馆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发掘,发现了九座陶窑和一批墓葬。这一发现被选为当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已经发掘的九座陶窑分布在相邻的两个山坡上,其中六座为椭圆形窑,一座为圆形,另外两座为长条形,是早期龙窑形态。窑内和废弃堆积中出土的陶片绝大部分为黑衣陶。这是继葫芦山发现之后,在闽北地区发现的第二处陶器烧造场所。在附近发现的墓葬中,除少数是牛鼻山文化时期外,绝大多数都以黑衣陶和黑衣几何印纹陶器为随葬品,特征与马岭墓葬、葫芦山遗址和肩头弄第一至第三

单元的出土器物基本一致,表明它们属于时代相近的同一类文化遗存。

(5) 社公岗二号墩外围墓葬

社公岗位于浦城县管九村的山下自然村西面,处于北部高山群脉向南延伸的长条形山岗上。2005年1月至2006年12月,为配合浦南(南平——浦城)高速公路的工程建设,福建博物院与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联合组成考古队,在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获得了一批重要资料和成果,被选为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主要发掘清理了六座土墩,其中在二号墩 PSD2M01 的外围四面清理出了八座墓葬,多为无墓圻平地掩埋和无规则浅坑形制,出土随葬器物多为黑衣陶,器形有罐、豆、盂等,其装饰风格和器物形态与马岭墓葬、葫芦山遗址、斗米山上文化层和肩头弄第一至第三单元的出土器物基本一致。

这八座墓葬的形制和随葬品情况如下:

PSD2M1 距地表深 1.8 米,无墓圻,墓底较平,出土成组随葬器物 6 件,其中 5 件为一组,另一件距离此组向北约 0.7 米,南北向分布。均为黑衣陶和印纹陶器。器形有罐、豆、盂等,豆体还刻有一些符号,纹饰拍印有菱格纹、方格纹等。

PSD2M2 分布在东南部,距 M01 南部东壁约 2.3 米,距地表深 1.1 米,无墓圻,墓底较平,出土一组较集中的随葬器物 4 件,均为陶器。器形有罐、豆、盂等,纹饰有弦纹及拍印菱格纹。

PSD2M3 距地表深 1.6 米,无墓圻,墓底较平,出土随葬器物 3 件,呈东西向直线排列,间距分别为 0.1 米与 0.8 米。器类为黑衣、赭褐衣陶和印纹陶,器形有罐、豆等,纹饰为拍印方格纹、篮纹等。

PSD2M4 距地表深 1.5 米,无墓圻,墓底较平。出土随葬器物 3 件,呈南北向直线排列,间距分别为 0.1 米与 1.1 米,均为黑衣陶器。器形有罐、豆等,其中豆体内刻有符号。纹饰为拍印方格纹。

PSD2M5 距地表深 2 米,为不规则梯形浅坑墓,东西长 2.6~3 米、南北长 2~2.8 米、深 0.1~0.6 米。墓底较平,出土随葬器物 3 件,三角形分布,南北向间距 1.1 米,东西向间距 1.9 米,均为赭、黑衣陶。器形有扁体罐、豆,豆体内刻有符号。纹饰为拍印篮纹。

PSD2M6 距地表深 1.7 米,无墓圻,墓底较平,出土随葬器物 3 件,呈三角形分布,间距均为 1 米。器形有陶盆、黑衣陶豆。

PSD2M7 距地表深 1.5 米,无墓圻,墓底较平。出土随葬器物 5 件,呈“7”字分布,其中一组为 3 件,向西 2.6 米置 1 件,向南 1.1 米置 1 件,均为黑衣陶器。器形有罐、豆等,纹饰有弦纹及拍印菱格纹等。

PSD2M8 距地表深 2 米,呈方形坑,边长 0.72 米、深 0.15~0.2 米。出土器物 2 件,一件为黑衣陶簋,一件为陶拍形器。

在这八座墓葬中,有六座未发现墓圻。很遗憾的是,由于后期的破坏,已经无法判断是否有土墩的存在。成组的陶器均被埋在深 1~2 米的地下,很有可能当时是有土墩的。果真如此,它们就应该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土墩墓,对研究土墩墓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四. 讨论

很显然,闽北地区的这类遗存的分布范围是相当大的,其中心区域是闽江上游的南浦溪流域、崇阳溪流域、富屯溪流域和浙江西南山地。林公务曾将这类遗存称为“马岭类型”。但是,由于马岭遗址只试掘清理了两座孤立的墓葬,材料较少,已经很难代表这类遗存,因此应该重新考虑命名问题。由于葫芦山是发掘时间最早、同时也是发掘规模最大之一的遗址,取得的材料在这类遗址中是较丰富的,我们建议将其统一称为“葫芦山文化”。

猫耳山和社公岗二号墩外围的八座墓葬取得了一批 C-14 测年数据,为我们初步判断这批遗存的年代提供了依据。社公岗二号墩下的 8 座墓葬出土的木炭测年则距今 4600 年,年代略偏早。猫儿山窑址的 10 个木炭标本碳十四测年最晚的距今 3465 年,最早的 4070 年。由于这批测年数据的详细情况尚未发表,而且大部份重要遗址都缺乏测年数据,目前尚无法进一步探讨其精确的年代范围和分期情况。不过,根据已有的这些数据,这类文化遗存的主体年代应该在距今 3500~4000 年之间。这与马桥文化的年代范围(距今 3200~3900 年)有很多重合之处。可以说,二者有至少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是共存的。

葫芦山文化与太湖和杭州湾地区的马桥文化的陶器和石器群的差别是巨大的。最明显的就是葫芦山文化根本不见鼎、甗等三足器和觥、觚等饮器,而鼎、甗、觥、觚等则是太湖和杭州湾地区的马桥文化主要器物。即便是两地均有的罐类器物,除了共有的凹底特征以外,其他在陶质、陶色和装饰纹样等方面,均差异很大。葫芦山文化的陶器群绝大多

数都通体施加黑衣,但黑衣陶在马桥文化中只占少数。在石器特征上,二者的差异更大。葫芦山文化根本不见马桥文化的有段石锛和斜柄石刀。到目前为止,葫芦山文化仍未发现任何青铜器,很有可能仍处于新石器阶段,这也与马桥文化有很大不同。

这两个差异如此大的器物群,根本不可能划归为同一个考古学文化中。从年代上讲,两个器物群也基本是同时代的,不存在前后传承关系。很显然,马桥文化的主体不是发源于浙西南和闽北地区,而是另有来源。由于目前对处于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之间的广富林文化的认识还很不全面,马桥文化是否是广富林文化的延续目前还无法作出判断。不过,正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马桥文化的陶器显然是受到了北方二里头文化、岳石文化和二里冈文化的很多影响,但在石器特征,却更多的是承袭了良渚文化的特点。所以,马桥文化很可能主要是外来北方文化因素与环太湖地区原有的文化的混合变化体,在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也接受了来自南方的一些影响(如鸭形壶、凹底罐等)。但是,马桥文化不是发源于浙西南和闽北地区的移民文化,这一点应该是很明确的。

注释:

有关马桥文化起源的各种观点的综述,请参阅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马桥——1993~1997年发掘报告》,上海

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

a.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马桥——1993~1997年发掘报告》,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b.宋建:《马桥文化的编年研究》,高崇文、安田喜宪主编:《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年。

牟永抗、毛兆廷:《江山县南区古遗址墓葬调查试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文物出版社,1981年。

牟永抗:《高祭台类型初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建所十周年纪念》,科学出版社,1993年。

福建省博物馆、光泽县文化局文化馆:《福建光泽古遗址古墓葬的调查与清理》,《考古》1985年第12期。

a.杨琮、陈子文:《葫芦山古陶窑窑址发掘的初步认识》,《福建文博》1993年1、2期; b.《武夷山发掘商代居址和窑群》,《中国文物报》1991年12月8日。c.杨琮:《论福建史前时代的陶窑及陶瓷业的发展》,《东南亚考古论文集》,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1995年。

福建省博物馆:《邵武斗米山遗址发掘报告》,《福建文博》2001年第2期。

福建博物院:《浦城仙阳商周窑址发掘的初步收获》,《福建文博》2006年第1期。

福建博物院、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福建浦城县管九村土墩墓群》,《考古》2007年第7期。

a.林公务:《福建境内史前文化的基本特点及区系类型》,福建博物馆编:《福建历史文化与博物馆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b.林公务:《光泽古墓葬出土陶器的类型学考察——兼论闽北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序列》,《福建文博》1990年第2期。

(上接第69页)

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② 王巍:《商文化玉器渊源探索》一文亦对此问题有详尽的研究,《考古》1989年第9期。

③ 尤仁德:《古代玉器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④、⑫ 刘国祥:《红山文化玉器研究》,台湾大学理学院地质科学系:《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论文专辑》,2001年。

⑤ 林巳奈夫:《中国古玉研究》,第351页,艺术图书公司印行,1997年。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玉器》,文物出版社,1982年。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安阳殷墟出土玉器》,科学出版社,2005年。

⑧ 邓淑萍:《试论新石器时代至汉代古玉的发展与演变》,《群玉别藏续集》,台北,故宫博物院,1999年。

⑨ 邵望平:《海岱系古玉略说》,《中国考古学论丛》,科

学出版社,1993年。

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两周卷》,第22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⑪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盘庚迁殷……说穿了就是为了对付北方和西方(夏遗民)的强大敌人。”

⑫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⑬ 宝鸡市博物馆:《宝鸡强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⑭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虢国墓地(一)》,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⑮ 三等祭祀的名称有别,但均是燃烧堆积柴薪,使烟气上闻于天神。详见彭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第22~23页,中华书局,2004年。

⑯ 沈文倬:《宗周岁时祭考实》,《宗周礼乐文明考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本期导读

本期《早期文明》专栏共刊载论文四篇,即何琳仪、王文静的《匍有土田考》、张闻捷的《试论商代巫玉的源流》、焦天龙的《论马桥文化的起源》、曹峻的《试谈马桥文化的泥质红褐印纹陶》。

《匍有土田考》是一篇对南方吴城出土商代中期陶文的考释论文。江西吴城遗址出土的商代早期陶文一直为海内外学术界所关注,其中一件属吴城文化第一期的灰陶钵底部所刻“𠂔𠂔𠂔田”四字,目前古文字学家们至少有三种不同的释义,今何琳仪先生独辟蹊径提出第四种新解,确使我们学界殊堪注目。首先,在读序上,他一反以往诸家也是一般最通行的自上而下再自右向左的方法,而是试采取自右向左再自上而下的读序。根据这种他认为远有所本的读序方法,何先生继而逐一考释隶定“𠂔𠂔𠂔田”四字应为“𠂔𠂔土田”,读“匍又土田”或“敷有土田”,即说明此陶钵主人是被商王赏赐有大量土地的江南方国诸侯,甚至进而说明西周诸王的“易(赐)田”制度实滥觞于商代。故此,作者对吴城商代这一陶文的新解,提出的问题较多,涉及的范围也较广,这不仅对研究中国古文字学史,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中国古代文明史特别是南方早期文明史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这是何琳仪先生的一篇遗作,今予刊载,亦权作对何先生的深切怀念!

众所周知,商代是巫术之集大成者,商代的巫玉为何如此发达昌盛?其源头在哪?《试论商代巫玉的源流》一文就是全面探讨此一问题的论作。作者在对新石器时代晚期即史前巫玉的产生和分布等情况基础上,从意识形态领域和玉器形态以及传播途径等诸多方面将商代巫玉与史前巫玉进行深入比较和综合分析,最后认定商代巫玉是继承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红山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凌家滩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巫玉传统并加以发展,才创造出商代独特、神秘而极具艺术性的巫玉系统。

本文最后还就西周巫玉衰退情况特别是原因作了深入探讨。作者认为,西周巫玉急剧衰退的根本原因是西周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变革对于艺术领域重大影响的结果。这样从深层次的社会结构的变革和意识形态的变化来寻求其衰退原因的答案,无疑方法是正确的,也是令人信服的。

众所周知,马桥文化是太湖地区一支夏商时期文化,然而对其起源问题,学界一直争论较大。近些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浙西南和闽北的肩头弄文化大量北上涌入太湖地区是马桥文化形成的主要来源,其数量甚至超过了马桥文化中的良渚文化因素。当然马桥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也多少接受了中原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的一定影响。总之,马桥文化是从浙西南和闽北地区移民来的文化观点似已趋于为大家所公认。然而,年来《南方文物》先后收到两篇有关马桥文化探源的论作,它们各自对上述较公认的观点都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挑战,甚至是截然不同的观点,现一并予以刊载,期盼能引起学界的关注和讨论。

《论马桥文化的起源》一文所持观点,不仅与前述学界一般所公认的观点截然不同,与《试谈马桥文化的泥质红褐印纹陶》中的观点也判然有别。此文在分别对马桥文化和肩头弄文化的第一、第二、第三单元的文化特征、年代逐一进行介绍和分析后,特别详细介绍了近十余年来闽北地区的一些重要考古新发现材料,如光泽马岭遗址、武夷山市的葫芦山遗址、邵武斗

米山遗址和浦城猫耳山遗址等,指出这些考古学遗存除有的下层有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外,其出土器物与浙西南肩头弄第一至第三单元的基本一致,表明它们属于时代相近的同一类文化遗存。这类遗存有着自身的文化发展系列,福建有的考古学者将其称为“马头类型”,焦天龙则认为,考虑到武夷山市的葫芦山遗址发掘时间最早、发掘规模最大、获取资料又较丰富,建议将其统一称为“葫芦山文化”。

此文在对分布于浙西南和闽北地区的葫芦山文化与太湖和杭州湾地区马桥文化进行比较后,认为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过去将肩头弄的所谓“第一单元”陶器群作为马桥文化的祖先文化带有很强的假设性,缺乏系统考古材料的支持。根据碳-14 测年数据,两者的年代范围基本是重合的,葫芦山文化的主体年代应在距今 3500 年至 4000 年之间,马桥文化的年代则为距今 3200 年至 3900 年,所以不存在两者有前后传承关系。从陶器和石器群特征看差别更是巨大,最明显之处就是葫芦山文化根本不见鼎、甗等三足器和觶、觚等饮器,而鼎、甗、觶、觚等则是马桥文化主要器物。即便是两地均有的罐类器,除共有凹底特征外,其他在陶质、陶色和装饰纹样等方面,均差异很大。葫芦山文化的陶器群绝大多数都通体施加黑衣,但黑衣陶在马桥文化中只占少数。在石器特征上,两者的差异更大。葫芦山文化根本不见马桥文化的有段石锛和斜柄石刀。到目前为止,葫芦山文化仍未发现任何青铜器,很有可能仍处于新石器阶段,这也与马桥文化有很大不同。

为此,作者认为马桥文化的主体不是发源于浙西南和闽北地区,而是另有来源。由于目前对处于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之间的广富林文化的认识还很不全面,马桥文化是否是广富林文化的延续目前还无法作出判断。所以,从现有材料分析,马桥文化很可能主要是外来北方文化因素与环太湖地区原有的文化的混合变化体,在文化形成过程中,也接受了来自南方的一些影响(如鸭形壶、凹底罐等)。

对焦天龙先生所持马桥文化之源的上述观点,当然我们尚可深入探讨,但文中特别重视和引证福建闽北地区一系列考古新发现材料确是很有意义的事,我想,随着今后浙西南地区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初期即早期文明的面貌必将日趋清晰。对马桥文化之源的探索,我不曾深入研究,但有一点笔者认为必须特别关注的是,即焦先生在文中提到的介于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之间的广富林文化。近年来,上海考古学者对松江广富林遗址的发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发现了众多的考古遗迹和大批文化遗物,随着今后资料的公布,相信对探索马桥文化之源会大有裨益的。

《试谈马桥文化的泥质红褐印纹陶》一文,作者通过对马桥文化中数量最多且有独具特色内涵的泥质红褐印纹陶的器类、器型和印纹的深入分析、比较,认为马桥文化中那种红褐印纹陶的胎质、器形和纹饰虽表现出与肩头弄类型相似的内涵,但仅有一部分陶罐如垂腹罐、直腹罐类器接受了肩头弄类型北上的影响,其他更多的器类如圆鼓腹罐、斜弧腹小盆、鸭形壶等以及包括云雷纹在内的印纹纹样则发端于马桥文化并向南扩散至肩头弄类型。因此马桥文化泥质红褐印纹陶反映的是太湖地区与浙西南闽北地区在夏商时期地区间文化交流和影响关系。

该文最后一部分内容还以广阔的时空视野,将马桥文化中的泥质红褐印纹陶与江南其他各分区如宁镇、赣鄱地区和闽江流域等地印纹陶进行概略性比较后,认为在纹饰、胎质、器物组合上均存在“大同小异”特点,是南方几何印纹陶文化系统重要有机组成部分,这种文化共性是居住于江南广大地区先秦百越民族的重要文化特征之一。马桥文化正是居于太湖地区百越民族的一支即于越民族的考古学遗存。

(彭适凡)